

深镌“九一八”的民族记忆文化记忆

——对谈“九一八国难文学文献集成与研究”首席专家高翔

本报记者 高 爽

受访者简介



高翔，辽宁社会科学院二级研究员，曾任辽宁社会科学院学术委员会副主任、《社会科学辑刊》编辑部总编辑等。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九一八国难文学文献集成与研究”首席专家，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出版《文化记忆的诗意重构》《现代东北的文学世界》等著作，发表《九一八国难戏剧中的沈阳叙事》《九一八事变创伤叙事文本考论》《钟理和小说的沈阳叙事研究》等论文。

对国难文学的整理和研究，开掘出一方新的言说空间

本报记者：高老师，我们谈话之前，首先要厘清几个概念。我们对抗战文学了解较多，但“国难文学”一词少有人知，您在研究中使用到抗战文学、国难文学、九一八国难文学等概念，它们之间有什么区别和联系？

高翔：现在，我们对九一八国难文学的界定是，通过小说、诗歌、戏剧、散文、报告文学等文体反映“九一八事变”的创作文本，可称为九一八国难文学。“国难”一词，古已有之，如曹植《白马篇》中云“捐躯赴国难，视死忽如归”。我们今天所用的“国难”一词源于历史，但并不是对历史已有概念的简单借用。

在抗战文学的大概念之下，将九一八国难文学作为独立的研究对象，其出新之处在于阐释角度的转变。以往讨论九一八事变后的中国文学，更多是基于抗日文学视角的解读。“国难”与“抗日”虽然意义上有交叉，但着重点不同，“抗日”多强调对爱国主义和反抗意识的文学表达，“国难”则重在对中国蒙难历史状态的文学呈现，显示的是过去往往被遮蔽了的民众的苦难常态，展示了一种新的认知角度，开掘出一方新的言说空间。

本报记者：我们从您所作的研究中得知，九一八事变后不久，国难文学就出现了，“国难文学”概念的提出几乎同步。这一研究脉络是怎样的？

高翔：一般认为，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最早使用“国难小说”者当为张恨水，他积极投入创作实践中，其作品数量众多，质量上乘。我的新书中收录他的小说《九月十八》即为其之一。在他的倡导下，众多作家纷纷加入，形成了较为庞大的国难小说创作群体和兴盛一时的国难文学创作热潮。

九一八国难文学的产生，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一个重大转折，与此前的以主张人的发现、倡导个性解放、倡导文化现代性和思想启蒙为特征的五四文学，有着截然不同的不同，它展示了中国现代文学一个新的时段和独特风貌。

从研究的角度来看，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对九一八国难文学进行研究的作家众多，包括阿英、鲁迅、茅盾、李何林、周扬、乔木、刘西渭（李健吾）、胡风等人。阿英是早期国难文学的重要研究者，早在1937年即编著《近百年国难文学大系》。鲁迅为萧军的《八月的乡村》、萧红的《生死场》分别作序，其中有一段很经典的叙述广为流传：“我却见过几种说述关于东三省被占的事情的小说。这《八月的乡村》，即是很好的一部……作者的心血和失去的天空、土地、受难的人民，以至失去的茂草、高粱、蝻、蚊子，搅成一团，鲜红的在读者的眼前展开，显示着中国的一份和全部，现在和未来，死路与活路。”

20世纪50年代以后至新世纪前，九一八国难文学文献的整理与研究难见踪影。进入新世纪以来，东北现代文学研究进入了一个全新的时期，但有关九一八国难文学的研究仍然欠缺。明确提出开展九一八文学研究是在2003年，我在《东北现代文学的反思与创新》一文中曾提出，21世纪至少有三项重大课题将构成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新的景观，其中重要的一项即“九一八文学研究”。2014年，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九一八国难文学文献集成与研究”立项，标志着九一八国难文学研究成为国家层面的社会科学研究工程。

核心提示

“国行公祭，立法典章。铸兹宝鼎，祀我国殇。永矢弗谖，祈愿和平。”2014年，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七次会议以立法形式将12月13日设立为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

今年12月13日是第十个国家公祭日，全国各地纷纷举办各种纪念活动，相关的学术研究成果也陆续发布。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九一八国难文学文献集成与研究”项目首席专家高翔出版的《九一八国难文学沈阳叙事文献整理与研究》，即是其中一个引人注目的新成果。

何谓国难文学？对沈阳叙事的文献收集和研究，现实意义何在？作为抗日战争起始地的辽宁，作为九一八事变发生地的沈阳，在九一八国难文学叙事中呈现何种样貌？

围绕这些问题，本报记者专访了高翔。



高翔编著的《九一八国难文学沈阳叙事文献整理与研究》(上下卷)。



九一八国难文学部分代表作品。

从“九一八”沈阳叙事的文本整理出发，实施文化再造工程

本报记者：在您的新作中，关于九一八国难文学的沈阳叙事，收录了小说、散文（报告文学）、诗歌、戏剧四种体裁共109篇（部）作品，其中大部分鲜为人知。您认为，这样的文献整理和研究现实意义在哪里？

高翔：沈阳是九一八事变发生地，是九一八国难文学书写无法绕开的重要内容，但历史上对以沈阳为题材的九一八国难文学作品的整理，几乎没有，至少不系统。

以它作为研究对象，一方面，可以拓展研究空间，对中国现代文学是有意义的丰富；另一方面，意在以此书打造九一八国难文学的文化层面的记忆。任何一种记忆，首先是个人记忆，但终究是要纳入集体记忆的。九一八国难文学无疑是由个案文本所组成，那是作者对国难生活的所睹、所思、所为，在众多个体作者的一致记忆中，形成了一个“从群体的立场看待此事的”“集体记忆”的过程。

我想，对九一八国难文学沈阳叙事文本的整理，目的就是实施文化再造工程，打造国难文学的文化记忆，进而实现文化认同。当然，此书对于文学地解读

关注时代、表现民生的精神，应为新时代创作者所继承

本报记者：您的新作中收录了不少作品，我们今天读来仍觉得很新鲜，比如戏剧作品《S·O·S》，甚至可以直搬演到舞台上。提供更多可借鉴和再利用的文本。我想这是本书给读者和研究者带来的最直接的价值。再进一步，东北叙事是今天文学创作和研究的一大热门，有人提出了新东北作家群和东北文艺复兴的说法。通过这次的文献集成工程，您觉得对于今天的文学创作都有哪些现实意义？

高翔：忘记历史就意味着背叛。我们的先辈以文学的形式留下了大量与时代同步的现代国难记忆，它同历史一样，具有不可替代性，这些文本积淀着民族的和集体的记忆，失去了它们也就失去了民族，失去了集体。对民族认同的创作文献

辽宁“六地”红色文化，也是很有现实意义的。

本报记者：我注意到，九一八国难文学的作者在地域上分布是很广泛的，有“九一八”的亲历者，也有外省市的创作者。您对作者构成有过具体的分析吗？

高翔：先说作者队伍及其分布，很有普遍性和代表性。来自东北的作家，有东北作家群成员，如罗烽、林珏、黑丁、蔡天心，有流亡关内的东北青年作家石光、刘黑柳，有死里逃生的难民黄甫瀛。东北之外的作家，有早期共产党人作家戴平万、左明、胡底；著名现代左翼作家田汉、陈白尘、欧阳予倩、适夷；著名教育家、思想家陶行知，民族实业家、革命志士杜重远，著名通俗小说家张恨水，甚至有台湾作家钟理和，还有许多身份不可考以及不知真实姓名的作者。这些作者遍布祖国大地，形成了举国上下共同书写九一八国难的壮观图景，表现了中国人民大敌当前同仇敌忾的中华民族精神。

本报记者：东北作家和非东北作家之间，存在着两种不同的创作素材来源——“九一八”亲历者的书写和基于新闻报摘

与传闻的书写。间接经验与直接经验相比一定是存在差异的，那些间接作品能够实现您所追求的还原文化记忆的目的吗？

高翔：我想起了西方学者对“见证文学”的理论建构，他们将奥斯维辛集中营大屠杀幸存者书写的文学作品，称之为“见证文学”，意为展示“邪恶统治给人带来的苦难”，给那段“黑暗岁月作见证”。也就是说，见证文学理论特别强调的见证文学标志性、关键性特征，就是文本的作者必须是亲身经历社会灾难的人：“只有那些被屠杀或者灾难吞没的人，才是彻底的见证人”，他们的证言才具有普遍的意义。但是，这种“彻底的见证人”是永远无法做见证的，因为没有人能够从死亡回归生命，来讲述他的死亡。

那么，如何面对这样的问题呢？我以为，无论直接见证还是间接，如果作品真实地展示了灾难与屠杀的罪恶和荒谬，显示了一种“诗性正义”的伦理维度，呈现出见证文学同样的效用，那么它也会进入见证文学的阵营中，发挥着叙事灾难、反思历史、开启未来的作用。对于九一八国难文学创作的直接经验和间接经验，也应是如此。

现历史真实的创作文本，应当是对它的强有力的回击。

我们进行九一八国难文学文献的整理，牢记历史，并不是要延续仇恨，而是以史为鉴，面向未来，祈盼一个和平的世界；当然也不是单纯地为了展示悲情，而是为了这种悲剧不再重演。我们经常重复的一句话是：“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我编著本书的一个重要目的，就是打造国家记忆，前事不忘，后事之师。

说到对于今天东北作家、辽宁作家的启发，我想主要还是关注时代、表现民生的精神，这是九一八国难文学的一个重要特征和创作精神，也是中国现代文学的优秀传统，是新时代的东北作家在创作实践中所应继承和发扬的基本所在。

文艺微评

编者按：《光明日报》报道，近年来，网络微短剧蓬勃发展，成为影视流媒体产业中备受瞩目的“新贵”。公开数据显示，2023年微短剧备案规划数量增长接近500%，上线备案数量增长约60%，业内人士预测，国内微短剧市场规模今年可能将达到250亿元。

那么，微短剧的出现会带来哪些文化现象，又会向哪个方向发展？为我们的生活带来哪些改变？有两位读者投稿本报，讲述自己的观点。

打造精品需注重三个方面

□张守志

当前，在影视文化产业降本增效的发展背景下，网络微短剧由于在制播投放层面所表现出的优势，以及受到微短剧赛道短期红利和流量收益的影响，需求的扩大、资本的加持以及平台的推波助澜，进一步加速了国产网络微短剧井喷式发展。纵观诸多“爆款”网络微短剧，其中不乏一批制作精良、内容创新的作品。其精品化的编创与制播策略，对国产微短剧积极健康的发展，具有极大的启示意义。

首先，以内容的精品化赋能网络微短剧的创新性发展。不难发现，当前国产微短剧创作越发重视内容题材的多样化与丰富性。从关注日常生活、贴近社会现实的创作题材到展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弘扬真善美的叙事内容，国产网络微短剧不断拓宽题材，深挖内容的社会价值和艺术价值，通过精彩、精湛的故事叙事，为观众提供情绪价值，激发情感共鸣。比如，微短剧《逃出大英博物馆》一度引发现象级刷屏，正是由于该作品富有创意的内容，以及独特的创作视角，在家国情怀的升华中，引发作品与观众的情感共振。

其次，以类型的精品化助力网络微短剧的产业化发展。就市场和受众需求来看，当前微短剧赛道的发展愈发呈现出产业化特征。垂直深耕产品类型，积累微短剧类型叙事经验，已成为微短剧创作和产业发展的必然趋势。因此，通过垂直细分微短剧类型，拓宽微短剧类型赛道，使其在不断规范化、精品化、产业化的发展进程中，拉新、留存、促活微短剧观众，促进国产微短剧完善工业化制播体系，提质增效地壮大其产业规模。

再次，以制作的精品化推动网络微短剧的产业化发展。国产网络微短剧的制作正在从“短、平、快”的“网感”制作策略，向制作阵容、制播水准的专业化过渡。部分网络微短剧在制作层面追求视听语言的“电影感”、情节叙事的“戏剧感”，给予观众较好的审美体验。比如，银龄题材微短剧《大妈的世界》、甜宠剧《拜托！别宠我》、穿越题材微短剧《重返1993》等，这些优质作品从影像叙事、情节编排、演员表演等层面，均呈现出国产网络微短剧制作向专业化迈进的特点。

当然，随着国产网络微短剧的频繁“出圈”与“出海”，关于其创作、制播、监管等问题，愈发受到关注和重视。在规范网络微短剧“野蛮生长”的过程中，不但要进一步加强监督管理，建立健全创作生产和内容审核制度。而且要从内容导向、审美品位、制播质量等方面，积极引导国产网络微短剧走向精品化的发展路径，以此紧密切合影视文化产业的发展需要，更好地满足广大观众的审美需求。

本质是网络文艺叙事的新表达

□刘艳妮

近几年，微短剧火了。《2023中国网络视听发展研究报告》显示，我国短视频用户规模达10.12亿。微短剧正是在用户规模庞大的短视频领域成新的网络文艺形态。几分钟一集的微短剧，因其时长短、节奏快、“爽点”密集而正在成为大众尤其是青年人喜爱的文娱消费新方式。

微短剧制作周期短、成本低、回报快，各大长短视频平台、小程序纷纷布局微短剧。于是，微短剧数量激增的同时也泥沙俱下，这与当初的网络文学极其相似。一些视频平台为争夺流量而降低作品的准入门槛，引发内容品质的问题。类型题材同质化、情节套路化、表演生硬浮夸的“作坊式”短剧比比皆是。有的名为微短剧实则满屏广告，微短剧是一种新兴的网络视听艺术，还是变相的“带货”工具？还有部分格调低下、打擦边球的内容乱象混淆大众视听，甚至歪曲事实真相。

时长短、投入低，不等于创作标准可以降低，文艺创作不该速成。“野蛮生长”期后的微短剧亟须提升内容品质，进一步探索短视频时代叙事艺术的新表达。

从现有题材上来看，微短剧在题材的广度与深度上还有待进一步挖掘，将镜头对准更广阔的现实生活才能让微短剧的内容表达有所提升。就像新近推出的微短剧《逃出大英博物馆》，文博题材的新颖与主题的立意高远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大众的审美疲劳——穿越、复仇、甜宠等套路该换掉了。

微短剧是“微”时代的一种剧集，它既体现短视频的短小精悍，又兼具剧集艺术的连续性。微短剧的“短”不是与长剧的“长”简单对应。短是因为它能满足观众的移动化和碎片化观看需求，随时能进入情节，剧情的相对集中带动观众较为强烈的情绪投入，增加了观剧黏性。微短剧作为一种叙事艺术，本质是网络文艺叙事的新表达，核心在于以短视频传播习性的视听表达方式讲好故事。也就是说，如何在单集时长几分钟内，用富有张力的叙事节奏流畅、连贯地讲述反转不断、高潮迭起又相对完整的故事，进而表达新时代的价值观。“探索短视频这种全新的传播媒介为叙事艺术带来的新变，如竖屏播放模式下镜头语言的运用对人物塑造的影响等，是微短剧向精品发力要更进一步深思的问题，考验着创作者的创作功力。

当然，微短剧从杂草丛生到精品频出，再到产业生态良性发展，总要有一个时间淘洗的过程。微短剧只有潜心打造精品内容，在故事质感与艺术呈现上多下功夫才能迈进精品之路。此外，创新运营模式，探索适合自身发展的经营之道也是微短剧专业化、精品化发展的题中应有之义。